

「創造轉化」與「雙向批判」—— 林毓生、張灝對殷海光自由主義文化觀的發展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Two-Way Criticism”: The Development of Yin Hai-kuang’s Cultural View of Liberalism by Lin Yu-sheng and Chang Hao

何卓恩 (He Zhuoen) *

1949年中國歷史發生大轉變後，中國近代思想史成為海內外學者關注的新熱點，中外學者都力圖在思想脈絡中尋找歷史轉折的根源。但多數學者基本上是在「史」的範疇內用功，述而不作；以「史」入「論」，從思想史中提煉出自己關於中國未來之路深邃思考的並不多見，林毓生和張灝可謂鳳毛麟角中的璀璨雙星。他們年資和經歷相當，林先生生於1934年，張先生生於1936年，都在少年時期隨家人從中國大陸到臺灣，在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負笈新大陸，並在美國名校終身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他們的每一部論著都曾引起學界熱烈反響。令舉世學者哀婉痛惜的是，這兩位成就卓著的同學、同行、同道，同在新冠疫情肆虐後期的2022年，不幸隕落離世。

我自學習中國近代思想史以來，即拜讀兩位先生的作品，其中張灝的博士論文《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和林毓生的博士論文《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不僅我自己多次通讀，也一再作為學術經典推薦給學友，皆獲益匪淺。林先生的《思想與人物》、《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張先生的《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幽暗意識與

民主精神》等，自然也是必讀書。

不僅僅從著作中領略兩位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思想，而且天賜機緣，我有幸聆聽到兩位先生的親自指教。這個「機緣」與研究鄉賢殷海光的思想有關。兩位先生在臺灣大學歷史系讀書期間，都修過哲學系殷海光開設的全校通選邏輯課，是殷先生最親近的學生「之二」。兩位先生後來一直保持對殷先生的敬仰，多次回臺灣參加紀念殷先生的活動，我得而直接請益於他們。

2003年3月我第一次去臺灣，搜集殷海光人生和思想資料。當時林毓生正駐足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做研究，在殷海光學術基金會資深董事陳宏正的聯絡引介下，得許登門求教。林先生素來以理論思維冷峻著稱，談起殷先生，卻毫不掩飾自己的激情。因為他工作忙，本來約定訪談一小時，結果足足談了三小時多。以林先生與殷海光在人生、事業上的密切關係，他所談的情況，在我看來，對殷海光研究來說，既是一種很重要的「意見」，又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所以將錄音的主要內容整理出來，在拙著《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出版時作為代序，希望分享給讀者。在整理的過程中，出現幾處由於語境所造成的表達錯誤，2009年臺北殷先生去世四十周年紀念會上，再次見到林先生，得到指點和批評，我在

* 作者現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向林先生一再致歉的同時，格外感佩先生治學的嚴謹。

2004年秋天我又去了臺北，適逢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在臺灣大學召開，印象中，這次我聽到了張灝題為「殷海光與現代自由主義」（大意）的主旨演講。會間，通過韋政通的介紹，我得以與張先生單獨餐敘，向張先生請教他與殷先生交往情況，往來書信保存情況，特別是張先生「轉型時代」、「幽暗意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雙向批評」等學術見解的理解問題。張先生溫文爾雅，娓娓道來，既是受教，也是享受。2009年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研討會，張先生也參加了，且又做了主題演講〈殷海光先生的理想主義道路〉。會場出來去住所的路上，我和一同參會的北京大學哲學系王中江，還被安排跟張先生同坐過一輛小車，我孤陋寡聞，當時還不清楚坐車的禮數，就按照中國大陸的習慣，請張先生前排副駕駛位置就座，張先生連說「好、好」，王老師趕緊糾正，說後排才是貴賓座。幸虧有見多識廣的王老師指教，不然就太失禮了。這次研討會似乎所有健在的殷門弟子和殷先生生前友好都到了，還到「自由墓園」殷海光先生、雷震先生墓前鞠躬致意，並拍照留影。

林先生和張先生都坦陳他們的專業研究是受到殷海光的感染。林先生曾提到，雖然他的一些具體見解後來有不少變化，但思想取向「從大學時代受到殷先生的啟蒙，開始服膺理知的自由主義以來，至今一貫未變」¹，殷先生關於「中國的大病根」在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的指導意見把他的學術興趣和個人關懷結合在一起了。²在對我的談話中他說，殷先生是一個根據自己思考發言的獨立知識分子，在一個不許說話的時代，「以他道德的、令人震撼的道德的熱情，硬要說話」，這種人格力量影響幾代人，「不只影響我，影響張灝，到現在為止還是我們生命裡面的有力的力量。……我們

的生命的力量跟殷先生是有關係的。」³張先生也說，他和林先生所做的研究，是受到殷先生的精神感動，沿著「殷先生思考的問題」在進行，⁴尤其是在經過殷先生這個「唯一的精神橋樑」所溝通的「五四」問題上。⁵殷海光是哲學教授，為了運思中國的出路，晚年大量收集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在出版《中國文化的展望》之後，有意要寫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殷先生沒有寫出這部書便身罹重疾而離世，但「殷先生思考的問題」特別是「五四」問題，卻成為林先生和張先生不懈努力和精緻思考的方向。

林、張兩位先生接續殷海光的，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心志。殷先生打算從哲學進入歷史，林、張二先生則從歷史考察走向了哲學思考。張先生主攻晚清民初思想史，林先生致力五四新文化運動史，都延續著殷先生的思考，而又在認知上對殷先生有顯著的突破，提出了一系列哲學論斷。如張先生對「轉型時代」、「烏托邦主義」、「烈士精神」、「幽暗意識」的發明，林先生對「自由」、「民主」、「法治」、「理性」的闡釋，都發人深省；而在傳統與現代關係的思考上，張先生提出的「雙向的批評」說，林先生提出的「創造性轉化」說，也都言人所未言，各具特色而互為補充。

張灝從臺大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師承當代漢學大師楊聯陞與比較思想史巨擘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又通過同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儒門弟子余英時、杜維明等人，接觸了一些現代儒家思想，漸漸聚焦清民之際的思想群體，且在同學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介紹下接觸到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理論，走出殷海光在激烈反傳統中求民主自由的思想框架。他提出的「現代化與傳統雙向批判」之說，主要建立在對「轉型時代」思想史的反省基礎上。張先生注意到，「從本世紀初年的梁啟超到十年前故世的殷海光，都主要是以現

1 林毓生，〈翰墨因緣念殷師〉（1980），見《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重校增訂本（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序言，頁9。

2 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影響〉（1994），見《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重校增訂本代序，頁26、27。

3 林毓生，〈我所瞭解的殷海光和自由民主〉，見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代序，頁14。

4 張灝先生與筆者的談話。

5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頁193。

代化為標準、為尺度，來對傳統作檢討、作批判」，⁶ 這個方向並不錯，因為現代化不但代表科技、經濟、法律、文化上的理性化，同時也包括政治上的理性化——民主政治的建立。以現代化來批判傳統，可以對傳統的局限性保持警惕，又可以發現傳統中可以持續的方面，從而使得傳統能夠得到整合，以適應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各個層面現代化的需要。

但是張先生又認為，僅此一個批判方向還不夠，現代化固然是國家發展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仍然不可過於迷信。因為現代化主要限於「功效理性」，並不產生精神價值，相反，容易產生泛科學觀和功利主義，往往造成文化思想上的病態，在人類生活精神的領域造成危機。因此，「我們今天不能只一味地歌頌現代化，無條件地接受它的價值」，「我們需要肯定它，但同時也需要檢討它，批判它。我們不但需要給它『定性』，同時也需要給它『定位』。而批判和『定位』的工作，是很有借助于傳統的必要。」⁷ 這就是說，在以現代化批判傳統的同時，也要「以傳統為借鏡」，用傳統文化裡蘊涵的人類永恆價值來檢視、批判現代化。發揮傳統對現代化補偏救弊的功能，當然不是僵化地搬用傳統；只有超功利地完整地把握傳統文化精神，才足以具備批判現代化的價值。而這種批判，主要也旨在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引導出一些不同的觀點，開展出一些不同的視野，從而間接幫助研究防治現代化所造成的問題。

為了說明中國傳統在與現代化雙向批判中的主動性和受動性，張先生在著作中還對傳統中居於主流地位的儒家精神智慧，作過一些具體的分析例釋。比如，他說儒家「天下一家」、「民胞物與」的社群意識，和諧與平衡的觀念，對人生終極價值的信持，無神信仰的人文精神等，都是反省批判現代化的極佳跳板。而對於中國傳統的局限，張先生結合他最關心的民主政治問題，批判最為集中的，是民主精神的缺乏，人性幽暗面的警惕不足。「在中國傳統裡始終沒有開出民主制度。雖然新儒

家經常標舉傳統儒家的抗議精神、批判意識、民本思想等，但是這些究竟只落在觀念層次，並沒有形成一套客觀制度。若不落實為客觀制度，這些思想必然缺乏持久性、有效性。這是基本的問題。」⁸ 張先生認為之所以民主傳統無法從中國儒家傳統中孕育出來，是因為儒家社會理論都倚靠在成德理想之上，這一精神缺乏對人性「幽暗意識」的瞭解，始終只能停留在道德價值層面，無法轉為制度的實踐。缺乏對人性「幽暗意識」的瞭解，也是造成現代思想者自由民主追求中「烏托邦」傾向的氾濫，最終對自由民主的實現造成傷害。

林毓生臺大畢業後，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師從世界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大師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並在西爾斯（Edward Shils）、史華慈、博蘭尼（Karl Polanyi）等著名學者課堂受教，帶著自由主義的特定問題意識，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深刻系統的研究和反省。在傳統與現代關係問題上，「五四」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多數具有迷戀理性，否定傳統的思想性格，林先生發現這裡包含一個很大的誤解，對自由主義理想的實現，不但不會有幫助，相反危害甚巨。

林先生檢討了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將自由與傳統對立起來的看法，認為這使得中國自由主義運動，長期停留在要求「解放」的層次上，這種負面的破壞運動，只能屏棄一些障礙，並不能帶來自由。整體式反傳統思想，實際上犯了「形式主義」或「抽象主義」的謬誤，使中國傳統的精神權威發生危機；另一方面，由於自己沒有一套活潑的、有創造性的思想，「西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西學的引進難免陷於口號化、功利化，和「錯置具體感的謬誤」。

林先生於是提出了「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見解，主張實現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他認為自由主義要超越過去那沒有生機的兩極，既不能像過去那樣全盤反傳統，又不能像某些新保守主義者那樣堅持「基於傳統」，而應該創造性地轉化，就像基督教的新教轉化一

6 張灝，《傳統與現代化》，《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309。

7 同上註，頁322。

8 楊白，〈訪張灝教授談幽暗意識與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前途〉，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頁230。

樣。傳統中糟糕的地方很多，即使好的地方，因時代變化能否發揚也很可疑。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不是「文藝復興」，而是把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這個工作無比艱苦而長遠，卻是一條有生機的出路。只有對傳統進行創造性的轉化，才不會陷入五四全盤反傳統與新儒家在傳統裡找安慰的窠臼。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是兩個獨立的文化系統。要將現代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主義內化為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為主流的中國傳統中去，是否可行呢？林先生表示了信心：「若對儒學重作一番解釋的功夫，我相信儒家道德理想主義與西方自由個人主義之間的新整合有相當可行的可能。無人能預言此一整合之結果；但是，對我而言，似乎僅有這樣的整合，個人自由主義始能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裡生根。這新的中國自由個人主義當然與西方的自由個人主義不能盡同。但是，它有許多要點是與西方自由個人主義相合的。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此一新整合的工作可能在其本身就是一有價值的工作，他們也許因此發現一個新的認同意識。」⁹他舉法治為例說，法治必須以基本人權為基設，但擁護基本人權的思想不必完全取自西方哲學傳統。西方自然法學說和契約論所支援的天賦人權說，同樣可以由「仁」的哲學來支援。將「仁」進行創造性轉化，不僅可以使過去的資源變成現代化的「種子」，而且可以實現精神的「認同」。

究竟如何創造地轉化中國傳統？林先生提出，消極的方面，必須克服無謂的論爭。在傳統文化秩序解體，而新的文化秩序尚未建立的境況下，建設性討論所需要的約定俗成的批評標準尚未確立，加之中國知識分子常有泛道德主義傾向，很容易懷疑對方的誠意，因此文字上的論爭常變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神經戰。在一種迫害狂的心情之下所做的說辭，只能是夢囈。積極的方面，必須以「比慢」（比慢不是比懶，而是比精）的精神，

對古今中外的經典詳加研讀。精讀典籍，有助於形成豐富而靈活的「支援意識」，有助於克服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領悟中國問題的特殊性，領悟人類智慧的貫通性。

總之，在張先生看來，處理現代化與中國傳統的關係，既要用現代化檢視傳統，看到傳統不適合現代化的一面而加以克服；也要用傳統永恆性基本價值來批判現代化，看到現代化脫離傳統文化基因的一面而加以補正。在林先生看來，自由主義的價值不能經由打倒傳統而獲得，只能在傳統經由創造性轉化而建立起一個新的、有生機的傳統的時候，才能逐漸獲得；建構中國式的自由主義，必須對儒家人文主義作創造的轉化。

如果說張先生的「雙向的批判」說重點解決的是傳統與現代的別異，那麼林先生的「創造性轉化」說突出回答的則是傳統與現代的促同。別異不是簡單的取捨；促同也不是無原則的折中或抽象的靠近。兩者共同致力於堅守自由民主理想而超越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對立，而這種對立從胡適到殷海光一直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迷思」。殷海光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已經感覺到這個問題，表示：「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要如何溝通？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對這問題下一點功夫去研究。」¹⁰林先生和張先生的思考，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殷先生彌留之際的一大遺憾。

就我個人領受兩位先生的教誨來說，距離當時的敘述，現在已經二十年過去。在這二十年裡，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縱深處，兩位先生的思想價值越發顯得珍貴。林先生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和張先生提出的「雙向的批判」理念，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中，雖然針對的已不一定是自由主義思想體系，而更多被嫁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系統，但其超越「五四」以來傳統主義、西化主義、折中主義長期對立的原創性活力，以及不囿於歷史一學的影響力，早已成為各人文學科的共同話題，甚至已經橫向影響到政治和社會各界，而走向社會治理的道德重建實踐。

9 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氏著《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頁195。

10 陳鼓應，《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頁70。